

戰後台灣的世代變遷與文化認同

● 胡悅晗、翟清菊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

美國學者王晴佳在《台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一書中指出，台灣史學的發展在五十年裏經歷了三次代際轉移。1970年代以來逐漸嶄露頭角的第三代台灣史學者，開始日益注重對台灣本土的歷史文化、風俗民情

與國族認同的研究。這一趨勢使得台灣史研究成為當代台灣史學界的顯學（參見王晴佳：《台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然而，由於王晴佳意在考察台灣史學的發展脈絡，故其在書中並未指出，究竟是何種原因促使第三代史學者聚焦於台灣本土研究。倘或不囿於歷史學的視野進而追問，1970年代後台灣新一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群體，有無某種共通的社會共相？如果有，這種共相的特徵表現與形成動因又是甚麼？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研究員蕭阿勤在2008年出版的《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以下簡稱《回歸現實》，引用只註頁碼）一書中，解答了這個問題。

蕭阿勤在早年研究戰後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學、歷史、語言等方面的體現與影響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1970年代對於1980年代之後台灣意識或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有着深刻的影響。為了進一步釐清此問題，在《回歸現實》中，作者在查閱大量關於台灣鄉土文學、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等方面的報刊雜誌、回憶錄、文集、校園學生刊物等史

在《回歸現實》中，作者引入學界關於「世代」、「認同」與「集體記憶」的相關理論方法，重點在於通過公共領域的公開言論，以及對當時台灣政治文化趨向有重大影響的行動者的社會行為，考察人們的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如何被形塑。

蕭阿勤討論了保釣運動以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1971、1972年間，戰後世代如何興起，並通過發展出「回歸現實」、「回歸鄉土」等理念，逐漸成為挑戰現有政治體制與文化傳統的主力；詳細描述並分析了「回歸現實」這一世代的三個主要群體的核心特徵與核心觀念。

料文獻的基礎上，引入學界關於「世代」、「認同」與「集體記憶」的相關理論方法，重點在於通過公共領域的公開言論，以及對當時台灣政治文化趨向有重大影響的行動者的社會行為，考察人們的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如何被形塑（頁61）。

蕭阿勤在書中採用的主要分析視角——「世代理論」，在1950年代以來逐漸為學界關注。該理論的核心觀點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概念是「世代」而不是「階級」，「世代」和「代溝」要為「在歷史演變中的運動」負首要責任（胡疆鋒：〈從「世代模式」到「結構模式」——論伯明翰學派青年亞文化研究〉，《中國青年研究》，2008年第2期，頁68）。該理論強調代溝在文化差異中的決定性及強調青少年共同的行為模式，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青年社會學與青年亞文化理論的主流話語。該理論的出現與二十世紀的社會學家推崇「價值中立」的研究宗旨，對階級分析論進行矯正有關。

從「世代理論」的視角考察青年亞文化，人們往往會忽略亞文化的階級性（胡疆鋒：〈從「世代模式」到「結構模式」〉，頁68）。有別於以往以人口學的量化統計方法研究「世代」的路徑，作者關注的是處於特殊歷史時期的世代文化與政治特質的傳遞與變遷。由於作者所關注的並非世代的客觀身份，而是身處特定歷史階段的人們基於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而形成的主觀認同，故作者對1970年代這一「回歸現實」的世代採取了模糊定義：「他們屬於年輕的戰後世代成員，從其中逐漸浮現，而組成份子想當廣泛，同時包括本、外省籍。相對於為數眾多的

整個戰後世代，他們是其中佔少數的知識階層成員而已。」（頁4）

循此思路，蕭阿勤首先討論了保釣運動以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1971、1972年間，戰後世代如何興起，並通過發展出「回歸現實」、「回歸鄉土」等理念，逐漸成為挑戰現有政治體制與文化傳統的主力；其次，作者詳細描述並分析了「回歸現實」這一世代的三個主要群體（發掘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文化界人士、鄉土小說家及支持者、黨外新生代）的核心特徵與核心觀念；最後，作者力圖在綜合全書基於主要經驗性研究論述的基礎上提升理論意涵（頁9）。

1960年代是戰後台灣新生代人口大量增長以及高等教育快速發展的時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一代知識階層開始大量出現，並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然而，戰後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及對社會的嚴密監控，使1960年代的戰後世代以消極、沉默的世相出現。他們大多不會採取集體反抗的行為，而只是以鬱鬱寡歡的心態步入成人社會。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與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這兩個事件，使身處大學校園或剛剛踏入社會的新一代知識階層開始深受重大外交挫敗的刺激，經歷了一個普遍「覺醒」的過程。他們強烈批判上一代人因伴隨其個人體驗與民族主義感的「流亡」心態而造成的孤獨、萎靡之狀，體悟到深入認識台灣社會、將自我與社會現實相聯繫的重要性，從而積極尋求直接參與社會政治改革的方式。為此，他們投入年輕一代本省籍的民意代表黃介信與康寧祥所領導的黨外反對政治運動（頁139）。

作者指出，形塑如此重要的歷史行動並引發社會鉅變的世代意識的源流在於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他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處身於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聯繫中，充滿一種覺醒的歷史意識，並積極地通過自身的社會行動在民族國家的歷史敘事中尋找自己的定位。從集體認同與集體記憶之間關係的角度看，「回歸現實」世代在理解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時，主要是把它們放到一個既有的、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中心主題的集體記憶——亦即關於中國人、中華民族過去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中去理解（頁119）。

也正因如此，開始出現陳少廷、葉石濤、陳映真等一批知識份子的批判現代主義文學、重新挖掘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提倡具有強烈社會批判意識的鄉土文學作品的問世。他們將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放到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族歷史敘事之中，使它成為其歷史情節發展的一部分；藉着這個特定的歷史敘事回答「我們是誰」、「我們為何生在這個時代」、「我們對這個時代與社會的意義是甚麼」、「我們要做甚麼、如何行動」等一系列與集體認同和行動有關的問題，進而建構了他們自身（頁195-96）。在重大歷史性創傷事件的記憶下，他們從社會更大的權力脈絡與結構來反思現狀，發展批判意識，強調文學的社會關懷與民族性（頁259）。

如果說1970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重塑台灣歷史記憶的焦點集中於日據時期的話，到了1980年代，以本省籍年青一代黨外人士及文化學者為主的更年輕一代則逐漸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者。他們通過重新發

掘台灣人的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將台灣的「鄉土」經驗納入抗日歷史敘事中，成為其敘事「情節」的一部分（頁282）。至此，作者為我們清晰地勾勒出在台灣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中，從中國（民族）到台灣（民族）的歷史敘事與認同的變化脈絡。然而，由於看到從敘事認同的角度中，本質的、真實的自我與敘事的、工具的自我之間的二分法並不符合歷史本身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因此作者指出：

如果認為這種較晚出現的敘事與認同才反映了他們「真實的」認知與情感，而七〇年代黨外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本的台灣歷史建構，純然只是工具性的自保說詞與行動策略，是認同議題的工具論的絕佳例證，那麼這樣的看法也是不恰當的。……八〇年代後黨外與本省籍文化界人士的轉化，反映的是情境變動中行動者反身性思考與實踐的結果，亦即反映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辯證的、過程的關係，而非行動者長久以來刻意遮掩的真實自我之最終展現（頁340）。

通過上述研究，作者提出三個核心觀點。第一，台灣的認同問題以及歷史記憶的創造不只是時代變遷問題，也是世代的問題。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第二代外省人與第一代外省人之間的差距，以及內部的階級與職業差異帶來的影響。第二，作者援引雅斯培（Karl T. Jaspers，又譯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參見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著，沈原譯：〈軸心時代的突破——軸心時代的特徵與起源〉，載蘇國

如果說1970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重塑台灣歷史記憶的焦點集中於日據時期的話，到了1980年代，以本省籍年青一代黨外人士及文化學者為主的更年輕一代則逐漸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者。他們將台灣的「鄉土」經驗納入抗日歷史敘事中。

儘管作者描述了戰後台灣「回歸現實」世代在社會與政治變遷方面起到的批判作用，以及他們對1970年代後從政治與文化方面形塑的台灣本土意識的決定性影響，但似乎也放大了這一世代在建構台灣公共領域與公共文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助、劉小楓主編：《二十世紀西方社會理論文選——社會理論的諸理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240），高度評價戰後台灣的這一「回歸現實」世代，認為其在當時與日後的政治與文化轉變中扮演核心角色，足以成為戰後至今台灣歷史的「軸心世代」（頁344）。第三，有別於早期中外學者認為戰後台灣年輕世代因為普遍消極順從、缺乏對社會政治事務的熱心而導致沒有出現類似1960年代西方反抗現有體制的青年學生運動的觀點，作者認為台灣的特殊政治與文化格局形成的歷史條件，使得戰後台灣的青年世代普遍反抗體制的現象比西方晚了十年，而台灣的戰後世代也涵蓋了比西方1960年代青年學生運動更廣泛、更年長的成員（頁353-54）。至此，《回歸現實》描述出從1960年代受制於威權統治的孤獨、流亡一代到積極投身社會行動，掀起台灣歷史上的社會鉅變的戰後台灣「軸心世代」，兩代人的世代變遷與政治文化認同。

然而，該書也存在值得商榷之處。首先，作者雖然要重構戰後台灣的「回歸現實」世代，但是他還是以文學作品為主要資料來解讀這一世代的。這使得一方面作者的世代研究過於側重闡釋層面，從而在量化實證層面有所不足；另一方面，由於過於強調這一世代的共性，難免對該世代內部的各種亞文化差異性有所忽略。其次，儘管作者描述了戰後台灣「回歸現實」世代在社會與政治變遷方面起到的批判作用，以及他們對1970年代後從政治與文化方面形塑的台灣本土意識產生的

決定性影響，但與此同時，似乎也放大了這一世代在建構台灣公共領域與公共文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廖炳慧關於威權體制對戰後台灣公共領域與公共文化方面產生的影響有專門論述：

真正的公共文化並未造成應有的影響，同時公共論述往往結合了私人的見聞及其親近領域中的論述經驗，因此在六十、七十年代報刊上常見的批評論述，是以寓喻的方式，簡介指出問題的所在，或者是以散文及短文轉彎罵人，……實際上並未構築公共文化及其抗爭層面，因為大致是閒談、挖瘡疤，談一些半私人或半公共的話題。真正構成對抗性的公共領域的論述，主要來自《自由中國》及《美麗島》等黨外雜誌，但《自由中國》隨着雷震被捕，……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經結束其公共論述的影響力。而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也使黨外人士試圖構築的對抗公共領域落空，讓台灣的公共文化在蔣經國的威權體制下，又回到蔣介石的封閉局面，直到1988年後情況才稍有改變。（廖炳慧：〈台灣當代公共文化的回顧與展望〉，載盧建榮主編：《文化與權力——台灣新文化史》〔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1〕，頁97。）

倘或將《回歸現實》所描述的1970年代戰後台灣的「回歸現實」世代與同時段中國大陸的紅衛兵一代作橫向比較，或許可以發現更多精彩之處。紅衛兵一代人在文革後期也經歷了一次普遍「覺醒」的過程。他們開始反思極權主義時代包裹在

理想主義外套下的狂熱運動，由此產生了對語錄與絕對效忠的質疑。徐友漁曾從世代角度對紅衛兵一代有過專門論述：

他們〔指紅衛兵一代人〕比上一代和下一代有更強的整體感和自我意識，因為文革確實給這一批人打上了鮮明的烙印，共同的經歷、境況和心態使他們能敏感地辨識同代人，並產生榮辱與共的心情。……這代人曾有輝煌的過去，但其中許多人的現狀卻是碌碌無為，這種巨大落差使他們產生難於擺脫的失落感。他們表現出強烈的自我中心主義，認為自己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中仍將起到關鍵作用。（徐友漁：《形

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頁243-44。）

將1970年代台灣與中國大陸新一代知識群體作比較，可以看到兩個群體都經歷了一次普遍覺醒後的回歸現實。台灣知識群體的普遍覺醒，源於對台灣以民族國家的身份納入國際社會遭挫的反思；中國大陸知識群體的普遍覺醒，則源於最高領導層權力之爭引發的對一場狂熱的理想主義革命的反思。若將1970年代發生在兩岸青年一代身上的普遍「覺醒」過程及其影響作一番細緻深入的歷史比較，則又當開啟一扇新的思考之門。

波長不合的尷尬

● 賈慶軍



山口久和著，王標譯：《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判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日本學者山口久和的《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判為中心》（引用只註頁碼）是一本十多年前的舊作，只是近年才被國人譯介過來。雖是舊作，其對章學誠的研究卻採用了全新的視角。這一新視角引起了國人莫名的興奮和激動，都

日本學者山口久和的《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判為中心》對章學誠的研究採用了全新的視角，引起了國人莫名的興奮和激動。然而書中存在着許多問題，如果不辨析清楚，對山口及其他學人而言似乎都不合宜。